
文学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

——克拉拉女士访谈录

(克拉拉 Klára Zombory 匈牙利汉学家，匈牙利著名文学翻译)

访谈人：Jiagu Richter

时间：2019 年 5 月 14 日

整理人：齐菲、Jiagu Richter

编辑：Jiagu Richter

问：你为什么选择中文作为专业，又是怎么开始学习中文的呢？

答：我是一个匈牙利汉学家，也是一名文学翻译，16 岁的时候我开始学习汉语，当时我想学一些特别的，不在常规中学课程中的东西，就选择了中文，告诉我的父母之后他们很惊讶，因为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不同，学中文的人极少，他们认为我这个想法非常奇怪，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支持我的选择。当时在布达佩斯只有一所语言学校，克勒希·乔玛·山道尔 (Kőrösi Csoma Sándor) 协会的语言学校，乔玛是一名非常有名的语言学者和首部藏英词典及语法书的作者，当时匈牙利唯一可以学习中文的地方就是这所学校。

问：这是哪年的事情？

答：大概是在 88 年左右，我 90 年中学毕业。



照片 1：2014 年在首届中卫安出版翻译恳谈会上，青岛

问：你说这是布达佩斯唯一的中文学校，为什么取他的名字？

答：因为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探险家、东方学家、藏学家，他是 18 世纪与 19 世纪之交的人，他只去过西藏，没去过今中国其他地方。

当时这是唯一正式的学习途径，大多数的老师都来自大学，但你也知道，中文学习一向都是开始时人很多，能坚持到最后的寥寥无几，所以最后完成了学习的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两个人。

问：这是一所大学之外的语言学校和东方学协会，对吗？

答：是的，但是它和大学有密切的合作，有很多师资力量都来自大学，这所语言学校面向社会招生，只要是对中文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报名学习。我想克勒希·乔玛协会至今仍然存在，仍然举办一些讲座，出版书籍等等。

问：你在那里学了多久中文？

答：大概两年。我开始学的时候是 16 岁，后来我很想在大学继续学习，所以就考入了罗兰大学（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当时也是匈牙利唯一一所可以学习中文的大学。即使在今天，学习中文的可能性已经多了许多，但我仍然认为罗兰大学的中文教育是最好之一，不仅是语言，还有文化和哲学方面，一切和中国有关的知识。

问：90 年代初你进入罗兰大学学习汉学？

答：是的，当时我的另一门主修是英语，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自己还是对中国更感兴趣，所以就选择了专注于学习中文。在 1994 年，我作为交换生去了北京，在北京语言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我在那里公费学了一年语言，那个时候是九十年代，外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是被隔开的学习和住，但我仍然在那里学习了很多，因为学习一门外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环境。在这段时间我经常出去旅游，所有的假期都用来旅游，我去了新疆、云南、海南、四川、甘肃、上海等，还有很多西南城市，这个时候我才了解了真实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可以说，这一年是我生命中最有趣和经验最丰富的一年，当时我只有 20 来岁，面对一个全新的文化，这一切在我的眼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年之后，我回到了匈牙利，但却想尽快再次去中国，于是在 1997-1998 年，我又去了北京大学。尽管当时我主修历史，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开始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学习，因为一些朋友向我介绍了刘震云、余华和莫言等非常优秀的当代文学作者，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习当代文学了。这可以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发现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我想将中国作者和他们出色的作品介绍给匈牙利。

在中国的第一年仅仅是学习了语言，而第二年我明确了我的兴趣和真正想做的事，当然，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将是自己会从事一生的职业，但后来中国文学的确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还翻译了很多电影文本（剧本），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也有很多获奖的好电影，当时我翻译了很多这类电影剧本，也算是和中国文学的第一次接触。

问：你翻译的电影在匈牙利上映了吗？

答：是的，因为那时是中国电影的一个黄金期。当时有个电视频道，叫做多瑙频道，他们会定期播放中国电影，所以那时候我翻译了很多电影，同时也要帮助他们校对匈牙利电影的字幕。这个工作对大学生来说非常有趣。

问：能参与这样的工作的确很有趣。

答：是的，尤其是当你可以去真正的电视台并且亲眼看到内部的事情，这对还是学生的我来说真是太有吸引力了。

问：1997 年你在中国学习了一年，这一年你开始了学习文学，当你回到匈牙利之后，1998 年，你开始做电影翻译，对吗？

答：不，电影翻译是在我去北大之前就开始了。

问：你的硕士学位也是在中国读的吗？

答：在匈牙利，我在中国的两年是额外进修语言、历史和文学，学位还是在罗兰大学完成的。

问：你继续读博士了吗？还是开始了翻译工作。

答：情况比较复杂，我开始了博士学位的学习，但是没有完成论文。一般来说从大学毕业后就需要生活独立了，我毕业后也是做了许多其他工作，比如中文教师或者公司文员和翻译等等，这些工作或多或少都和中文及中国有关，但没什么专业性。在做这些工作之期间我做了很多翻译工作，比如《狼图腾》等。当开始翻译《狼图腾》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需要学习很多关于蒙古的知识，所以我去找了相关课程和老师，因为虽然这是一部中文小说，但是里面很多内容是和蒙古有关的。



照片 2：2008 年在罗兰大学孔子学院《狼图腾》新书发布会上

问：也就是说你毕业之后，虽然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但你仍然觉得翻译才是你最大的兴趣所在，对吗？所以你是为了翻译放弃了其他工作吗，还是两者同时进行？

答：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到 2014 年，我做很多不同的工作，只花一部分时间来

做翻译。翻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我的兼职，但这仍然是我真正想做的。我虽然开始了博士学习，但最后并没有尝试写博士论文，所以最后也没有博士学位。

问：你在翻译方面做了许多，你的老师告诉我，你翻译的作品《狼图腾》非常受欢迎，反复再版了很多次。

答：是的，这是一本很受欢迎的书。它只有一个版本，但对匈牙利人口来说已经是销量很高的书了。不过《狼图腾》不是我的第一本翻译作品，我最初翻译出版的书是《妻妾成群》，其中也不仅苏童的一篇小说，而是五位当代小说作者的合集，苏童、余华、韩少功，刘震云和马原。这本书是 2013 年出版的。这是匈牙利的第一本中国当代小说出版物，虽然没有多次出版，但仍然非常成功，因为很多评论家和批评家对它进行了点评。坦诚地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我为这本书感到自豪。

回溯到大学时代，有一点我还没说起过，就是我当时非常幸运，因为我遇到了陈国(Csongor Barnabás)当我的老师，他是一名非常好的老师，在翻译方面，他翻译了《西游记》和《水浒传》以及很多其他古典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他翻译的质量非常高，匈牙利学者都是通过他的翻译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他是我的老师之一。另一位老师是杜克义(Tókei Ferenc)，他主要翻译古典诗歌，以及很多非常重要的中国古典哲学书籍，比如《道德经》和《论语》。我还有另一位老师，他叫米白(Miklós Pál)，他也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史学家，比如他介绍了敦煌石窟，也翻译了老舍的作品。高安德(Galla Endre)也是我的老师，他的研究题目是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也翻译文学作品；还有尤山度(Józsa Sándor)，他主要是研究历史方面，翻译了溥仪的传记。还有姑兰老师(Kalmár Éva)，我以前的教授，同时和朋友，中国文学的编辑和翻译。这几位是我在大学生涯中遇到的最重要的老师。对我来说他们非常重要，我坚实的基础离不开这几位大学老师的教导。尽管当时的图书馆还不太大，藏书也不多，当代文学的图书更没有了，但他们推荐给我很好的作品，对我进行指导，比如陈国，我给他的翻译作业往往要反复推敲，翻译数次，但他仍然觉得可以做得更好，他教给我如何仔细地完成一份工作。

问：他是一位严格的老师，但可以让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答：是的，他非常诚实，会夸奖你的优点，但也会严厉批评你的缺点，不会因为个人关系就随意敷衍。很不幸，今年年初他以 90 多岁高龄去世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直到去世之前他还在翻译《金瓶梅》。

问：著名的中国小说都被翻译成匈牙利语了吗？

答：翻译了相当多，虽然我们国家不大，但的确翻译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我父母那一代人里有很多知识分子读过中国古典文学，比如《道德经》几乎每个知识分子家庭都读过。现在想找到好的中国书籍更难了，但从前它们流传得相当广。我父母那一辈的人读得中国文学作品比我这一代人要多，但这也是世界性的现象，人们读得书越来越少了，但我的父母都读过《西游记》、《道德经》和《论语》，即使他们并没有和中国有什么特别的联系。

问：你觉得问题在于好的中国原文书变少了，还是好的匈牙利语译本变少了？

答：好的译本变少了。到八十年代末为止，匈牙利出版了很多中文书的译本，但90年代初开始——不是我夸张——除了我和有限的几个人之外，没什么很多人把中国作品翻译成匈牙利语了，特别是当代作品。但是应该提及最后几年在匈牙利出版翻译中国图书的情况有明显的好转。



照片 3： 2014 年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问：你觉得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们的关注转移到其他语言的作品上吗？

答：首先一个原因是没有足够的从业者来从事翻译工作，很多人想找收入更高的工作。文学翻译的工作规律就是你需要为一本书工作好几个月甚至一整年，整个程序很漫长，往往要等很久后才能有结果，如果想要赚钱，这当然不是什么好工作；之所以从事这一行，你必须要有其他的动力才行。很不幸的是，有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在干了一段时间后，会觉得这一行太难，太费时间，最后往往会选择改行，或者去做媒体工作，或者去外国企业等。匈牙利人并不是对中国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很感兴趣，但他们接触不到太多来自中国的作品。中国出色的文学作

品和作者很多，都非常有翻译价值，但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太少了，肯出版这类书籍的出版社太少了，这是没有太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匈牙利出版的重要原因。

问：但你父辈的时期很多人都读过中国古典文学的译本，是说明当时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比较多吗？或许那时候的人还没有那么多机会去中国赚钱。

答：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师们一样，当时翻译作品和教书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但到了我这一代，比较年轻的一代，他们有更多可能去和中国建立联系，进行商业合作。我们已经没有像上一代人一样的工作环境了，他们那时候是一直在不停翻译各种小说、古典作品和哲学作品。他们也没有很多的人，但至少还是有五六个人在持续做翻译这件事。经济方面，当时匈牙利还是共产主义国家，不管你是大学老师还是从事其他工作，待遇都差别不大，如果是在大学工作，那么除了专业科研和教学之外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也不需要考虑去哪所学校、教什么课等问题。当时的人的其他的机会可能比现在少，但做事也更加专注。



照片 4：2015 年与莫言在北京

问：《我的中国故事》，这是你写的书吗？

答：是一本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书，由很多来自各国的汉学家记录他们和汉学的故事，我也参与了这本书，用英文写了之后由出版社翻译，一篇文章大约三十页。所有参与这本书的汉学家都获得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问：这个“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是由谁颁发的？

答：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你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委”，这是颁发给出版和翻译中国图书的外国人的最高奖项。我也不是为了任何奖项而工作的，但这个奖对我是一种鼓励，让我意识到我应该改变、应该

自己来决定自己的一生，从此以后我就专心从事翻译工作，一直到现在。

问：你现在在翻译什么呢？

答：苏童的《米》，这是最近的一本，我还翻译了余华的《第七天》，几周前刚刚完成，大约会在七月出版；现在开始翻译《活着》。我翻译了不少余华的作品，同时，还有另外一本书：《这就是马云》，这不是文学作品，作者是马云的助理陈伟，今年 1 月出版了。2019 年是非常成功的一年，有很多作品得已面世，另外一些也在准备出版。我和广东省作家协会有一个大型合作项目，准备出版三本书，广东籍作家的文学作品选集，一本是诗歌合集，一本是论文合集，一本是短篇小说合集。



照片 5：2016 年在北京国际书展上

问：这套书已经出版了吗？

答：还没有，我担任共同编辑，而不只是翻译，因为这套书近千页，翻译还由我的同事和学生完成，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了，正在在编辑过程中，会在年内出版。

问：你是负责哪个语言的编辑，中文还是匈牙利语？

答：我负责匈牙利语译本，是项目管理，负责找合适的翻译，核对中匈翻译，并且对匈牙利译本的一切事务负责。广东作家协会选择文章，然后我来负责一系列翻译和出版工作。

问：你非常高产！

答：我的家人已经对此有微词了，这一年我的确有些超负荷运转，等忙完之后我会稍微放慢速度。

问：我也一直在做书籍的编撰工作，如果一年能出一本我就很满足了。

答：但是您还教书，收集和编辑各国汉学家们的材料等等，一年出一本已经算很了不起。。。翻译呢，也非常花时间，我无意抱怨，但过去的一年真的过于忙碌了，翻译工作必须在电脑前进行，一坐下少则几个小时，多则一整天，常常意识不到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有时候我会想：不行，我必须少做一些，但是我还想尽量多地翻译各种各样的书。

问：你是直接从中文翻译成匈牙利语吗？

答：除了很早前有一本是从英文翻译的之外，大部分都是直接从中文翻译，我认为文学作品不太适合多次翻译。

问：也会把匈牙利语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吗？

答：从来没有，文学作品最好由母语者来翻译，匈翻中方面有一位有名的译者和作家，叫余泽民，大多数的当代匈牙利小说由他翻译的，他也是我的好朋友，翻译过程中经常帮助我。

问：眼下你正在翻译余华的《活着》，现在进度怎么样了？

答：才刚刚开始，两三周之前我们刚刚举办过一个书展，我接待了很多中国代表团，非常忙，没时间专注于翻译。我刚刚译完余华的另一本书《第七天》，但需要继续翻译的东西仍然很多。

问：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我很喜欢。翻译这类书的时候，你也会投入自己的感情吗？

答：经常会，我常常投入太多的感情，翻译一本书的时候仿佛和这本书建立了情感上的连接。比如在我翻译苏童的《米》时，这也是一本非常悲伤的书，其中有很多悲剧，虽然都和我的真实生活无关，但我也会为主角的遭遇感到痛苦。不过老实说，中国文学作品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没有圆满结局，至少我读过的、翻译过的书里，经常离不开悲剧。

问：或许中国人认为这样会更感人。

答：在文学作品中，悲剧也不一定总能激起人的兴趣，但比起喜剧，悲剧的确更打动人，读者也会投入更多的共情。严肃文学悲剧尤其多。

问：悲剧也比喜剧更有力。

答：也许是的。不过我也翻译一些截然不同的书，而我还很想翻译给非的新书《隐身衣》或阿乙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等。我总是有太多计划，好书也太多了。

问：你怎么选择中文作品呢？你会参考匈牙利读者的喜好，还是以你对中国作家的评价为标准，或者让市场需求来决定？

答：你的问题非常好。刚开始的时候，比如《狼图腾》和《论语心得》，这两本是当时中国的畅销书，是出版社先选择了书，然后再选择我来翻译；但是现在这些苏童和余华等等作者的作品是我推荐给出版社的，当然要照顾到匈牙利读者的喜好，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书本身的质量和文学价值。另一方面，照顾本土读者也是很有必要的，有很多书在中国非常火爆，但在欧洲遭到冷遇，因为读者们不了解背景。这些书的读者很多对于中国人是常识的事情不太了解，比如孔夫子是谁，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本地读者可能对其一无所知。

翻译中国文学当然不同于翻译捷克文学或者斯洛维尼亚文学，你要做的不只是翻译，而是要试图在两种文化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如果只是翻译字句，匈牙利读者无法读懂而感到非常陌生和遥远。一部从中文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其中的信息往往是过载的，尤其是古典文学作品，全书满满都是注释和引用。对读者来说，只选择简单易懂的文章当然不应该，但这种信息过载的情况也不好。中文是一种非常精炼的语言，一个字往往要好几个匈牙利词语才能解释，每个字的含义也各有不同，这对翻译来说都是难点，比如双关语就很难全部翻译成匈牙利语。所以我认为太简单和太难的作品都不适合拿来翻译，比如有很多历史哲学背景的作品，这对匈牙利读者来说可能太难了。

同时我自己的兴趣也比较重要，我在城市里长大，所以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对展现城市生活、城市变化的题材比较感兴趣。整体来说，我选择的书不会离我们的生活太久太远，也不会是完全现代背景；尽管我很喜欢那些发生在八、九十年代，讲述城市巨大变化的故事，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生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作者，比如余华、莫言和格非等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没什么文学可读，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们却写出了如此伟大的作品。我喜欢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末期的作品，我还有很多这个时期的书要翻译。

问：你不太会选择是什么些书？

答：不好这么说，我比较倾向于说会选择哪类书籍，因为我不选择一本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有质量问题，而仅仅是因为它在我的视线和知识范围之外，或者说我认为也是在匈牙利读者的兴趣之外。我最新选择的两本小说还是关于现代中国的——不是眼下，是八十年代，文革后的故事。

问：所以你会选择的还是关于文革之后的作品，而不会选择的是因为可能匈牙利读者不太感兴趣，大概是哪个时期的呢？

答：这个和时期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关于人。个人角度来说我不太喜欢那种充满太多复杂历史背景的故事，比如追溯到清朝历史之类的，我不太推荐这种，对读者来说也更晦涩难懂。莫言的《蛙》，故事是从50到60年代开始的，这个时期的故事对匈牙利读者来说就非常有趣，因为我们曾经也是共产主义国家，虽然发生的事情不尽相同，但读者至少可以产生一些共鸣。

问：因为 50、60 年代的匈牙利也经历过类似的时期。

答：没错，我认为文学是理解中国人思想的一个好途径，我觉得稍微上年纪一点的人比现在的年轻一代对此更感兴趣。我也试图去选择一些当代背景的故事——当代背景当然不是指 2019 年，而是指 80 年代之后。去了解中国人在飞速发展中发生的故事是非常有趣的，比如一些发生在东北城市的故事，我喜欢这类故事。

问：2000 年之后已经过去了二十年，而中国在这二十年中变化太多，身处其中的年轻一代人，他们的书写语言可能都发生了改变，你也会选择这类作品吗？

答：也有吧，但在这方面作为翻译者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如你所说，语言变化太快了，有时候我甚至连我女儿的匈牙利语都不太明白，所以如果你要翻译一个讲述当今北京或上海青年生活的小说，那你就必须在那里生活，必须去过那里。当然我也对徐则臣和路内等等青年作者非常感兴趣，但说实话我还没有翻译过他们的书，所以我还不确定自己能否很好地完成这个工作。当然，翻译的时候是可以请教母语是中文的朋友，我在这里也有很多中国朋友，但尽管如此我目前为止还没有翻译过什么青年作者的作品。

说一点题外话，我很想介绍几句匈牙利-中国友好协会有关图书出版和中国文学，文化的推广活动。四年前我当选了中-匈友好协会的会长，你也知道，如果一本书仅仅是出版的话是不够的，读者还没法接触到这些书，在这方面，虽然匈-中友协并不是专业做图书宣传的协会，但它的工作之一就是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化介绍到匈牙利，我们工作人员也都是志愿者，并不拿工资，我们想要推广中国文化。我在这个协会里的作用就是接触很多文化从业者，你听说过吉狄马加吗？他是一个诗人，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他的诗歌翻译成了匈牙利语，我们协会匈牙利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个新书发布会；在协会的联系下，还推广了一本非常精美的中国年画集《中国民孤本年画精粹》；我之前提过的好朋友余泽民，他和他的太太也出版了很多好书，图书，我们尽量帮忙宣传他们的书。我们协会每个月都会组织活动，邀请和汉学家、中国有关的学者、记者或摄影家等等来参加。唯一的选择条件是与中国有一定的关系。比如两天前我们邀请了一对夫妇，他们曾在鲁迅文学院参加一个月的作家会，并且就此写过一本书。我们有很多文化活动。今年是匈中建交 70 周年，我们要为此举办一个研讨会。

问：你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答：计划不如变化。不过我的愿望是建立一个只出版中文书的出版社，这么多年来我在工作上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和各种出版社打交道上面，花太多精力了，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经理而不是译者。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但目前看来在未来一两年内还没法实现。我手头上现在还有一大堆书等着翻译，同时我也想举办一些活动，把中文书籍介绍给匈牙利读者，也可以邀请一些作者。我觉得作者本人能来非常重要，他可以直接和读者建立联系，这很重要。另一方面，我也想找到一些年轻的同伴，我们一起工作。接下来马上就能实现的内容是要翻译四本小说，其中三本已经完成初稿了，此外我还为中国政府和机构，还有 CCTSS（中国文化译言网）翻译一个百位作者计划，里面介绍了一百位中国当代作者和作者，这些以后都可以在网上看到。最后就是要完成广东省的那个项目。

问：你的工作很多，四本小说的翻译，百位作者计划，还有梦想要实现。

答：我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或许有时候我应该减减速了。

问：翻译是一个在家就可以完成的工作，那么你有去中国的计划吗？每两年你会和作者和译者们会面，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但除此之外呢？

答：今年我被香港作家协会邀请去了香港，整体来说我至少每两年都去一次中国，或者是公共活动，或者是作协邀请。我有很多工作，有很多交稿日期，也不是总有时回去中国，但我觉得亲眼见证中国的变化很重要，中国每年都在变化，我在北京待过两年，但此后每次回去的时候都会看到不同，新的建筑，新的地铁线，等等等等。去年我去了贵州，发现不仅仅是城市在变化，乡村也在变，这和欧洲完全不同，不管是匈牙利还是奥地利都是百年来没什么变化的保守国家，当我去中国的时候，会觉得：我的天哪！一切都变得飞快！这和欧洲人缓慢的生活节奏完全是两回事。我想看到这些变化，所以会尽量回去看看。现在，我的下一个计划是让我的孩子去中国看看，他们总是在问我关于中国的事情，我女儿已经 14 岁了，我儿子 9 岁，他们该看看书本之外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了。

问：他们也学习中文吗？

答：我总说他们应该去学，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如果他们感兴趣，我当然会提供帮助。

问：你对中国有什么期待呢？觉得中国会走向哪里？

答：我只是一个文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就像上面说过的，中国的变化飞快，这当然是好的，经济方面同样发展很快，这都是好事，但有时候，当我回到中国，我会有一点怀念那个有些慢、有些老式的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比不上从前了。回到中国的话题，我觉得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国了，没人可以忽视中国的发展，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发展作为基础，我才有机会介绍并推广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我不想参与太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内容，能做的就是做人与人之间文化上的交流，毕竟不了解文化也没法展开经济合作。

问：有很多汉学家，比如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持批评的态度，你怎么认为呢？尤其是最近十年的文学方面的境况。

答：我知道，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态度比较悲观。我觉得如果一个国家有大量的作者，大量的作品，那就必然存在一些出色的作品，问题就是对于外国研究者来说很难从中把好作品找出来。一个人能读的东西是有限的，我能接触到的作品也有限，尽管有来自朋友、协会和西方报纸的推荐，但我能读的还是很有限；我也不是中国当代文学学者，翻译就需要花很多时间了，我没有时间去做研究。我认为当然存在很好的作品，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出现在世界视线中一批文学作品，但 2000 年以后，如果去找，还是能找到很多精彩作品的。